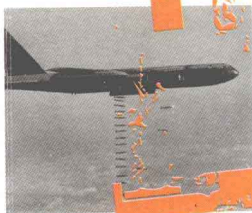


This Pulitzer Prize has been awarded since 1942 for a distinguished example of reporting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cluding United Nations correspondence. In its first six years (1942-1947), it was call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Geographic Reporting - International. The Pulitzer Committee issues an official citation explaining the reasons for the award. List of winners and their official citations:



1942: Laurence Edmund Allen, Associated Press, "for reporting on the British Mediterranean Fleet."

1943: Ira Wolfert,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 "for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battle of the Solomon Islands."

1944: Daniel DeLuca, Associated Press, "for his distinguished reporting during the year 1943."

1945: Mark S. Watson, The Baltimore Sun, "for distinguished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London and the French and Italian fronts in 1944."

1946: Homer William Bigar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 distinguished war reporting from the Pacific."

1947: Eddy Gilmore, Associated Press, "for his correspondence from Moscow in 1946."

1948: Paul W. Ward, Baltimore Sun, "for his serie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1947 on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

1949: Price Cox, Baltimore Sun, "for his series of 12 articles entitled, 'Experiment in Freedom: India and Its First Year of Independ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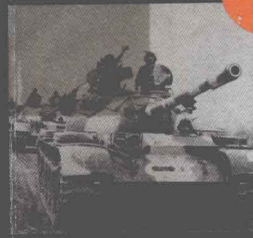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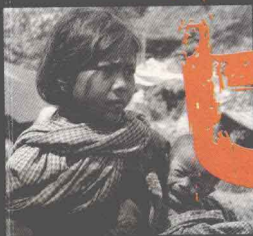
1950: Edmund Steve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or his series of 43 articles written over a three-year residence in Moscow entitled, 'This Is Russia Uncensored.'"

1951: Keyes Beech (Chicago Daily News); Homer Bigar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rguerite Higgin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elman Morin (Associated Press); Fred Sparks (Chicago Daily News); and Don Whitehead (Associated Press), "for their reporting of the Korean War."

1952: John M. Hightower, Associated Press, "for the sustained quality of his coverage of new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ing the year."

1953: Austin Wehrwein, Milwaukee Journal, "for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Canada."

1954: Jim J. Lucas, Scripps-Howard Newspapers, "for his notable front-line human interest reporting of the Korean War, the



战火之外

Sydney Schanberg's

[美] 西德尼·尚伯格/著
宋伟/译

战火以外，千折百回，
友谊至死不渝。

美国著名战地记者
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

西德尼·尚伯格

Sydney Schanberg

首次关于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内战的
全面报道

直击越南战争真实现场
揭秘伊拉克战争背后真相

奥斯卡获奖影片

《The Killing Fields》真实蓝本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B E Y O N D
T H E
K I L L I N G
F I E L D S**

Sydney Schanberg

战火之外

[美] 西德尼·尚伯格/著
宋伟/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1N06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火之外 / (美) 尚伯格著; 宋伟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 4
ISBN 978-7-5613-5921-1

I. ①战… II. ①尚… ②宋… III. ①新闻报道—作
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296 号

BEYOND THE KILLING FIELDS: War Writings

by Sydney Schanber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otomac Books, Inc.

Copyright © 2012 by SYDNEY SCHANBERG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25—2011—159

战火之外

(美) 西德尼·尚伯格 著 宋 伟 译

责任编辑 王西莹

特约编辑 乔振华

封面设计 瀚 愔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921-1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前 言

我是怎样开始了解战争的以及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 001

第一章

柬埔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 003

第二章

杀戮场 / 073

第三章

越南，1972 / 135

第四章

返回柬埔寨：一场军事政变 / 166

第五章

美国掩盖在越南遗弃战俘的事实 / 186

第六章

布什主义在伊拉克 / 210

后 记 / 220

前 言

我是怎样开始了解战争的以及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刚出校门时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在经历了两年的驻德服役之后，这种情况也仍未有所改变。那时是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时期——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之后我来到《纽约时报》，成为一名办事员，每周领取四十九点五美元的薪水，给在第十层工作的社论主笔们做些复印、跑腿之类的工作。

十年之后的 1969 年——当时我已经做过一些犯案采访，还报道过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新闻——我被委派到国外，任新德里分社的总编，负责南亚地区（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等）的工作。这个新环境里也没有战争即将迫近的迹象，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0 年 4 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听取了亨利·基辛格的建议，派出大批军队“入侵”柬埔寨——一个一直试图保持中立的弱小国家。在越战期间，美国军队席卷了柬埔寨。此时在西贡^①的分社需要

^① 越南胡志明市的旧称。

增派记者来维持采访工作，而我正是其中一员。

1970 年末，南亚巴基斯坦的大选引发了东巴基斯坦的自治运动。1971 年 3 月，巴基斯坦政府派出军队镇压自治运动。印度以自由运动代表的名义卷入了冲突。12 月，印巴战争爆发，我随着印度前行的军队报道了整场战争。不到两周，巴基斯坦人就投降了。

我的一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一次战争任务。1972 年，当越南开启了一轮长达六个月的战乱时，我再次被派往越南。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会时常回到柬埔寨——那个正在逐渐沉沦的国家——我一直留在那里报道它的末日时光。当时，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正在使这个国家陷入崩溃。

为什么要出版一个过去战争故事的合集呢？这么做有什么益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在我这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来，我们这个星球，或许华盛顿政府尤甚，已经习惯了频繁的战争。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人的这句忠告早已被抛到了脑后。

我们美国人不能好好地吸取历史的教训，这点早已臭名昭著。或许这本书能让人们记起战争的真实面目。而现今出现的屠杀之残忍比起历史上的记录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了解到这些，那么下一次再有政客宣称我们必须入侵、摧毁作恶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却掩藏着其他目的时，我们会反复思量一下。

而之后，或许我们将不再认同。

西德尼·尚伯格

纽约 纽帕兹

2009 年 9 月

第一章

柬埔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概述

作者手记：该文取自《战争之罪：公众应该知道什么——现代战争之罪恶研究》，罗伊·古特曼和大卫·里夫编辑（纽约：诺顿出版社，1999）。本章其他文章皆取自《纽约时报》。

过去的三十年里，柬埔寨一直深陷于战争、种族灭绝、奴役、逃难、饥饿和疾病的阴霾，现在又经历着激烈的内部冲突。这里发生的一切犹如二战时欧洲纳粹对犹太人的那场大屠杀在亚洲的重演。

柬埔寨与泰国、老挝和越南等国毗邻，国土面积与密苏里州相类。1975年，当疯狂的红色高棉游击队席卷金边，并开始了极端农业革命最重要的“净化”运动时，柬埔寨有七百万到八百万的人口。四年之后，1979年，红色高棉被赶回到丛林里，身后留下累累罪行：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柬埔寨人丧生在“闻名”于后世的“杀戮场”上。整个国家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惨遭杀戮，这个比例如果放在美国，人数将达到五千万到六千万。

有一些学者声称，从技术角度上讲，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不能算作种族灭绝，因为在那里，多数时候是一些高棉人在屠杀另外一些高棉人，与国际法中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不同，他们并没有试图消灭另一个“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群体”。

然而，人们在做出此类语义上或法律上区分的同时，却往往抛弃了常识。毕竟，红色高棉曾试图抹除一种文化，企图摧毁柬埔寨宗教的重要基石——小乘佛教。这也许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法律在辨查屠杀行为时，其指导意义显得如此微弱。不管把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称作种族灭绝，还是简单地将其看成对人道主义的侵犯，这个事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魔鬼降世。

因此人们可能会把在柬埔寨发生的一切，用来例证法律处理类似犯罪时的弱势地位。国际法的效力终究是要建立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同意遵从和执行的基础上的。在柬埔寨的案例中，多数民族国家都表示出震惊和骇异，但却未采取任何行动。更有甚者，虽然1979年越南等入侵并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在金边建立了亲越政府，但此后几年里，西方国家仍认定同一批红色高棉官员为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华盛顿方面与其同盟一方面谴责红色高棉的暴行，另一方面却固守冷战思维。他们认为，与其将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拱手让给越南及其后台苏联支持的政府，还不如保持现状。权力政治才是最高法令，而不是法律。

为了给人类历史留下公正的记录，让我们来看看红色高棉到底都对柬埔寨民众犯下了何种罪行吧。在抗美援朝胜利几个小时之后，红色高棉就采取了第一次行动，他们剑锋一转，把所有城镇居民都驱赶到远乡郊的劳动营。队伍途经的村镇全都清空。事实上柬埔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迫劳动集中营，掌控在“最高权利机构”——“安卡”的铁拳之中，而这一切还算不上恐怖。

红色高棉大力推行锁国战略，外界无法窥探到其中的真情。恐怖即将到来。新统治阶级在巴黎留学归来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的领

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彻底打破家庭、佛教信仰和乡村这柬埔寨社会的三大基石。在痛苦不堪的转移中，人们被驱赶到远离故土的远方营地。孩子与父母分离，被安排在青年营中，在那里他们受到当权者的教育和理念灌输，要他们检举父母和周围成年人所有违反“安卡”统治的行为。婚姻全由“安卡”来安排。学校关闭，货币废止，工厂倒闭，报纸停刊，收音机被没收……

佛教寺庙或被捣毁，或被关闭。红色高棉掌权期过后，原来六万多的佛教僧人只剩下了大约三万人；其余的僧人或被屠杀，或由于过重的劳役、疾病、折磨而致死。穆斯林少数民族占婆人也成为清除的对象。

然而，对宗教的迫害只是个开始。简单说来，红色高棉将所有认定为“不纯”的柬埔寨人列为潜在清除对象。“不纯”的人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人口聚居区长大的人，受过任何外国文化“污染”的（包括懂得外语的）人，甚至戴眼镜的人也包含在内。不管任何人，只要被怀疑与病态的农业革命方向有悖，就有可能被清除。所有可疑的柬埔寨人都被打上了“新人”的标签，与“纯净”的人民区分开来。有时“新人”还被要求戴上特别的围巾（很容易令人想起纳粹要求犹太人必须佩戴的黄色大卫之星袖章）以作区分，这样就很容易把他们从人群中挑出来，被挑出来的“新人”往往都会被拉去处决。

红色高棉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口号：“饶你一命没什么益处，杀死你也没什么损失”。在这句凶残的魔咒下，至少一百五十万柬埔寨人惨遭杀害。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行抗美战争胜利游行时，我正在金边，看到了他们冰冷的面孔和一潭死水般的眼神。他们下令全城撤离，要求所有人去往乡下加入神圣的革命事业，不愿离开的人都要被杀掉，游击队战士甚至要求伤员离开挤满人的医院。两百万满心恐惧的市民走出首都。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医院里全是伤员，地面因布满了血迹而湿滑异常。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伤员，只能做些急

诊手术。消毒手套用完了，医生只能把双手在盛消毒液的碗里浸一下就来到下一个手术台前继续工作。撤离命令下达时，金边市的医院里有五千到一万名伤员。他们多数都不能行走，只能靠亲属推着床走出医院，身边挂着血袋，沿着大路离开市区，向着“革命”的大地走去。

外国人可以到法国使馆区避难。我亲眼看着很多柬埔寨朋友被赶出金边，多数都再也没见到过。我们活下来的都感觉自己像是背信弃义之人，自己得到保护，却没有尽力营救朋友。我们为此感到耻辱，直到现在仍不能释怀。

两周之后，红色高棉政权将我们驱逐出境，他们用两辆载重卡车把我们运到泰柬边境。此后柬埔寨就完全陷入封闭状态。外界看不到里面发生的事情，屠杀即将开始。

可柬埔寨的悲惨境遇并非是从红色高棉掌权才开始的。1970年3月，由朗诺将军领导的亲西方派别在华盛顿政府的授意下废黜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并将其流放至国外，早在那时起悲剧就开始上演了。西哈努克是一位中立主义者，他多方退让以迎合美越双方，使柬埔寨免于卷入越战。他同意美国在柬埔寨境内秘密地轰炸越南避难所，同时也允许越南使用柬埔寨的港口城市磅逊（又称作西哈努克城）为避难所运送物资。

西哈努克的下台，预示着朗诺领导下的柬埔寨对越南的宣战，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早就希望在金边有自己的党羽来取代之前的中立主义者，因此命令美国军队从越南推进到柬埔寨边境，对避难所进行了持续六周的攻击。然而，总统对朗诺并不是很有信心，因此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况下，决定入侵柬埔寨主权领土。直到后来尼克松总统在国家电视台上向全美公众做出通报之后，袭击已经展开时，才将入侵决定告知朗诺。

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柬埔寨正式地变成了一枚冷战的棋子，整个事件最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变在于：1970年红色高棉还不是重大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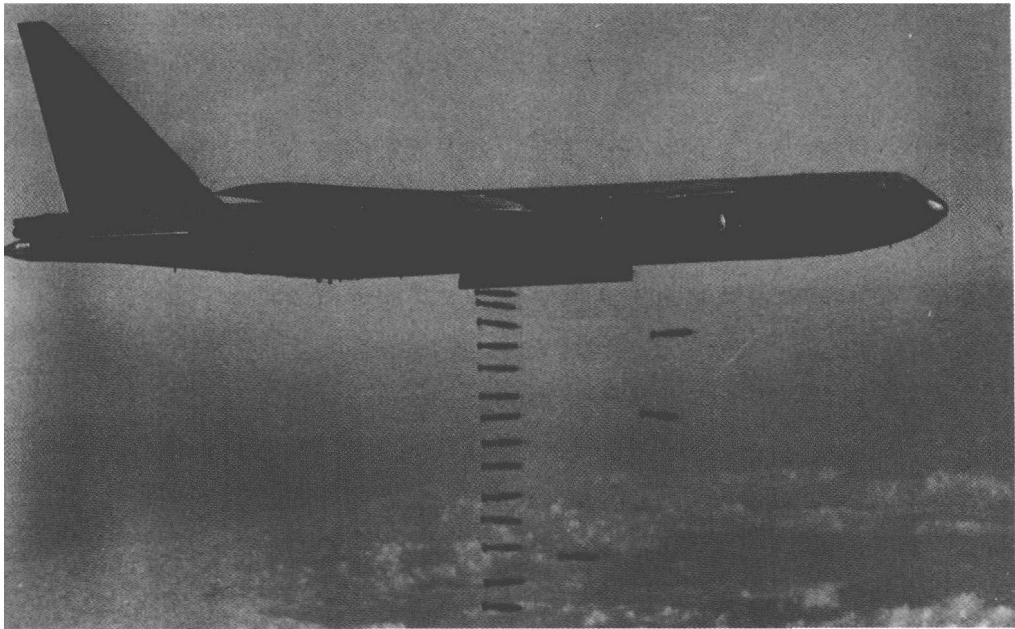
只不过是一些鱼龙混杂的杂牌游击队，总人数最多也不过三千至五千人，五年之后却扩充为一支拥有七万至十万人、横扫金边的凶残力量。不断扩大的战事使红色高棉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获得了充足的人员补给，同时他们也从越南军队那里得到了战斗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至少在开始的两年，双方还未因严重分歧分道扬镳之时还是如此）。

这五年的战争惨绝人寰。几个世纪前，战场上的柬埔寨勇士有一个传统，他们会把败将的肝切下来，炖熟了吃掉。他们坚信这将使自己获得力量，还能得到不被敌人杀掉的护身法宝。由于这个以及无数其他的原因，国际社会要求对降敌保持尊重的呼吁在这里被完全无视。

战争初期，在金边南部的一个城镇里，朗诺的军队杀掉了两位越南人士，把两人烧焦了的身体拼整了一下，头朝下地悬挂在镇广场上随风摇晃，以此警示任何想要协助敌人的民众。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亨利·卡姆试图告诫朗诺军队的指挥官，说这样对待死者的尸体有违《日内瓦公约》。那位指挥官觉得这话很好笑，他径自走开，留下那两具尸体仍旧扭曲地悬挂着。

随着越南军队向柬埔寨逐步深入，朗诺政府开始掀起了反越运动。恐怖突如其来并逐步加深，很快柬埔寨国内为数二十多万人的庞大越南居民群落就成为这场群体狂击的目标，尽管他们在这里居住数代并早已成为柬埔寨公民。大屠杀开始了。很多住在河边，靠打渔为生的越南人惨遭屠杀，很快他们的尸体就成打地浮到湄公河上。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斯是一位菲律宾裔的柬埔寨政府军将军，后来成为军队总司令，他在这时开始利用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平民做自己军队的盾牌，把他们赶到队伍前面，迎着越南人的枪口——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际法的。费尔南德斯却表示异议，他说：“这是一种新式的心理战。”

西贡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抵抗，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人最终被安排在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里，受到保护性拘留。他们中有很多最后迁移到南越地区，受到暂时性的保护，等待着狂热的情绪平静下来。



B-52 轰炸机在进行“地毯式轰炸”

随着战争的深入，政府军控制的国土一寸寸地减少（至少朗诺政府控制的地区是在减少）。斗志高昂的红色高棉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的只剩下首都地区、几条运输通路和几座省城。为了保住这几条供给线路，美军每天都会对乡下的红色高棉目标进行一番轰炸。多数轰炸时使用的都是巨大的 8 引擎 B-52 轰炸机，每架轰炸机可以装载二十五吨炸弹，可造成地毯式的破坏效果，因此经常会伤及无辜平民。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金边和省城。战争开始时，首都的人口为六十万人，到 1975 年战争结束时，人口增加到两百万。驻金边的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政府的基辛格团队坚称，难民逃亡只是为了躲避凶残的红色高棉。我经常到难民营，那里人们对红色高棉和美军轰炸的抱怨都不绝于耳。有些农民根本没有逃跑，红色高棉利用他们对轰炸的愤恨，把他们招入军中当兵或做搬运工。

这些轰炸说明了战争中一个近乎公理的事实：国际法中并未禁止使用的所谓“传统”武器可以造成与禁用武器一样恐怖的效果。

在柬埔寨，B-52 轰炸机经常三架编队，每架庞大的轰炸机装载二十五到三十吨重的炸弹，机群炸弹总装载量达到七十五到九十吨。

B-52 轰炸机丢下的炸弹在地面形成破坏网，或者应该称作“破坏箱子”，可以根据军队的密集程度来改变破坏网（一般为一千米宽，两千米长）的尺寸和形状。在这些大规模轰炸（有时会把尸体和泥土扬起到一百多英尺高的天上）之后幸存的士兵往往都无法继续服役，他们有的会留下永久性的伤痕，有的变聋，有的对尖锐的声音和响动恐惧到极点。1991 年海湾战争即将结束时，就是这种攻击摧毁了向巴士拉^①撤退的伊拉克军队——后来这条路被人们称作“死亡公路”。

1973 年，一架 B-52 轰炸机误炸了湄公河畔一个政府军控制的城镇——乃良，约四百柬埔寨人伤亡，多数是无辜百姓。美国大使馆出面道歉，并按浮动比例对受害人家属给予一定的补偿：丢掉一支胳膊或腿的补偿几百美元，丢掉更多的会额外多一些补偿，而死者获得的补偿会更多一些。有平民在战争中丧生时，军队会说这都是无意的，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平民伤亡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在大范围内释放有杀伤力的武器时。五角大楼把平民伤亡的情况称作“附带损害”，这就如人们把凝固汽油弹称作“软武器”一样，都是为了给公众一个对于战争更温和、纯净的印象。

很巧的是，在越战和柬埔寨战争中，B-52 轰炸机扔下的炸弹刚好有凝固汽油弹 CBU（集束炸弹）。CBU 是一枚重达五百多磅的巨大炸弹，其中载有数百个小弹头。典型的 CBU 会在落到离地面很近时像蚌壳一样张开，如骤雨般地向下面释放出小炸弹。其中有一种叫做 CBU-3，小炸弹的弹头装有凝固汽油弹，能使敌军深陷火海或夺走空气中的氧气，使敌军窒息而死。另外有一种 CBU 装有特制箭头，可撕裂人肉，也可把受害者钉到树上或地上。有时外行人很难看出这些武器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之间的区别。两种武器都会使人产生恐惧感。政府告诉我们，自那次战争以后，凝固汽油弹和箭头因其负面形象，都已从美军 CBU 库存目录中清除了，但

^① 伊拉克东南部城市，位于波斯湾附近的阿拉伯河。它是该国的唯一港口。

其他种类的 CBU 仍在使用，比如在 1991 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就仍有 CBU 的踪迹。

事实上，凝固汽油弹仍在作为燃烧弹使用，尽管五角大楼已经给它换了名字，还声称已经对其中的化学配方做了变化。新的炸弹被称作 MK-47，取代了之前的 MK-44。炸弹中化学成分改变的唯一结果就是使它的燃烧性变得更为剧烈。

还有，该如何看待老式火箭弹呢？它们总被用作威吓百姓的武器，是不是也都应该禁用呢？在那场长达五年的战争中，红色高棉不断地向金边投射呼啸的火箭弹。它们并未直指军队。这些火箭弹做工粗糙，尾部呈扇叶状，从头顶飞过时会有破空的鸣哨声。你会知道火箭弹什么时候开始垂直下落，因为那时鸣哨声就会消失。火箭弹从城市周边人造的木制平台上发射出来，并不指向明确的军事目标，他们只需要把这些火箭弹投到塞满难民的城市里，任何地方都行。这些投落的火箭弹，散在市场里、校舍中、场院上，溅起残肢和烂铁。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平民恐慌，而他们成功了。

有时炮弹也可用作威吓平民的武器。1974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红色高棉将一台缴获的美产 105-mm 口径榴弹炮对准金边，沿着城市南部扫射。最初，炮弹落在半月弧形的空地上时，爆炸没有任何效果，而之后炸弹扫到一片叫做萨德姆科尔的聚居区时，死亡开始降临。炮弹引起了火灾，在疾风的吹动下房屋很快就陷入一片火海。不到半小时就有将近两百人死亡，另有两百人受伤，基本全是平民。警察用小型卡车把尸体拖走。——周围没有任何军事目标。

不管是在柬埔寨还是在其他的大屠杀场，在任何年代里，人类屠杀人类的野蛮以及这种野蛮的不可避免，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永恒不变的教训是，所有反人类的战争、种族屠杀或犯罪都是暴力的，有它们存在的地方，法律和文明行为这些概念就毫无意义可言。

这样说来，试图加强国际法的适用性及其强制力是否就毫无希望了呢？不，从来都不会无望的，只要我们相信有进步的空间，不管

空间会多么微小，希望就总是会有有的。无论从本性上还是从传统上讲，记者都应秉承这种信念，或至少也应坚持这种原则，努力使坏事不至于变得更坏。也就是为此，才有了这部文集。

等待和平自天堂降临

1972年11月2日

金边——“我们是等待着和平自天堂降临的可怜人。”一位西方国家驻金边使馆的前台接待员一脸愁闷地对来访者说。他所说的几乎是全国人的愿望。上自总统朗诺，下至人力车夫，柬埔寨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和平协议的签署，无助地把希望寄托于那些他们所不能掌握的国家 and 势力的慈悲之举。他们希望经过两年半不期而至的战争之后，协议的签署能为他们富饶美丽的国家带来和平。

内阁大臣们告诉百姓说北越和南越军队就要撤退了，等到那时柬埔寨政府会与当地的红色高棉消除分歧——“一切都将恢复原状”，但在这里的外国观察家们却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两周前公开的印度支那九条和平协议中，只有一条是关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中并未涉及在这两个国家停火的内容，也没有提及要在这些地区实施国际监督。协议中只提出，所有“外国”军队都应撤离柬埔寨和老挝。但因为河内方面从未承认有自己的军队在这两个国家驻扎，所以多数在这里的国际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待这一条款会对北越有约束力。

“政府觉得北越人会逐渐离去，”一位多疑的柬埔寨人说，“这与他们在1970年签署最后通牒，要求北越人滚出去时的幼稚表现如出一辙。我猜，现在他们又要下发最后通牒了。”

朗诺将军对红色高棉下发的第一份最后通牒，是在1970年3月18日，他和同党废黜现在流亡在外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之后不久。这些反叛者们不喜欢西哈努克政府的腐败，也不喜欢西哈努克亲

王允许在柬埔寨境内建立北越边境避难所的纵容态度——他们本可以通过这段边境向南越发动军事行动的。

红色高棉对1970年那次最后通牒的反应是——冲出避难所，向西强力推进，在柬埔寨全国多处发动了袭击。美国军队随即从南越赶来，力图摧毁避难所，并消灭行踪不定的敌人总部——因五角大楼的宣传而闻名于世的“COSVN”（南越中央办公室）。

两年半后的今天，避难所和供给线路的范围和发展程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COSVN依然存在，而且状况很好，北越和他们的柬埔寨盟友控制了至少三分之二的柬埔寨国土——有些人估计这一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甚至更多。金边政府只控制着主要城镇和人口聚居区——大约占柬埔寨七百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美国每年对柬埔寨的援助猛增到三亿美元。援助的金额滋生了政府和商业圈的腐败，引起学生、知识分子和很多受到压制的政治反对派的不满。

即使北越军队撤离柬埔寨，柬埔寨政府还是要面对国内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经北越的打造，已经成为一支装备精良、极富侵略性的游击队。政府方面极尽努力，想要说服红色高棉倒向自己一方，但从现有报告来看，成效并不显著。

奇怪的是，柬埔寨人对美国把他们拖入全面战争并不生气。他们只是祈祷美国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他们知道，美国为自己安排的任何和平协议，他们都会同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妥协就是我们的使命，”一位柬埔寨官员称，“它是无助的代名词。”

印度支那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误炸

1973年8月9日

柬埔寨，乃良——周一发生的误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镇中心的大型目标都被炸毁，其中包括一些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战士和家人居住的木头茅草屋区也全被夷为平地，原来的住宅区现在变成了垃圾遍布的空地。

周一晚上，美国大使馆描述误炸造成的伤害时用了“极微”的说法。

“我看到城里有一些炸弹，不过也算上什么大灾难，”大使馆空军武官大卫 H. E. 奥普弗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破坏极其微小。”

路透社报道：驻金边的一位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周三美国飞机轰炸了金边至西贡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村庄，这已经是三天内发生的第三次误炸事件了。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方面否认了报道的真实性。

周一的爆炸中有将近四百人伤亡，成为印度支那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误炸事件，美方称此次轰炸是由一架装载二十多吨炸弹的 B-52 实施的。官方数据显示有一百三十七人死亡，二百六十八人受伤，多数是士兵和他们的家人。美方最初称伤亡人数在一百五十人左右，但后来承认了统计上的错误。

然而，实际上伤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因为统计中并未包括轻伤人员。另外，有些市民认为还有一部分遗体埋在废墟中。在城镇的某些地方，腐肉的气味仍然很浓重。

在湄公河东岸，距离金边东南三十八英里的乃良沉浸在凝重而悲伤的氛围中，人们对遭到同盟的轰炸都迷惑不解。每个人都有亲戚或朋友丧生，甚至有整个家庭都被炸死的。

昨天下午，我看到一位士兵在岸堤上不住地抽泣。“我全家人都死了！”他大哭着，捶打着木质长椅，瘫倒在那里，绝望地叫道：“我全家人都死了！照我的相！照我的相！让美国人看看我的样子！”

他叫陈凯欧，妻子和十个孩子都在爆炸中遇难，留给他的只剩下八个月大的小儿子。爆炸发生时，这位四十八岁的士兵正在几英里外的地方站岗执勤，因此逃过一劫。